

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

王宗华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秘密回师北京,于10月23日发动了推翻直系军阀政权的政变。这次政变,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往后的历史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过去对这次政变研究较少,也未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对这次政变的原因、结局及其性质和历史作用作点初步的探讨。

—

北京政变发生时,人们普遍地感到“突如其来”,其实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由来已久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阀的矛盾,以及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都在发展。北京政变就是这些矛盾在其相互联系中斗争发展的产物。

直系战胜奉系后,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力图实现全国的“统一”。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其矛头对准了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和奉皖两系军阀,从而加剧了直系与粤、皖、奉的矛盾,促成了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反直三角联盟的形成。当时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统治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与直系军阀的矛盾是这个矛盾的集中表现。直系军阀与奉皖两系的矛盾是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广东革命势力与直系的矛盾和奉皖两系与直系的矛盾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孙中山反直与段祺瑞、张作霖反直的目的也不一样。但他们都要求反直,又都没有单独战胜直系的力量,因而相互联络而逐渐形成了反直三角联盟。于是出现了反直三角联盟与直系的矛盾斗争。

1923年6月,直系军阀逼走了总统黎元洪。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全国人民掀起了反贿选运动。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并电请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卢通电不承认曹锟总统资格,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张作霖继起响应。反直三角联盟与直系的矛盾更加尖锐。反直战争虽然暂时没有能发动起来,但都在加紧准备中。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各地人民反对直系军阀暴政的斗争进一步发展。政治形势的发展是不利于直系军阀的。

在此同时,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也在发展。在曹锟贿选前,直系内部就有洛派与津、保派的分歧。曹锟上台后,津保两派为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也发生了冲突。同时,为了争夺地盘和兵权,吴佩孚与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等的矛盾也尖锐起来。

反直三角联盟与直系的矛盾斗争必然反映到直系内部来,加剧直系内部的矛盾和分化。直系内部的矛盾斗争又造成了反直三角联盟分化直系的条件。

在直系内部,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最为突出。这是冯成为这次政变的主角的重要条件。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不到半年就被吴佩孚夺去了河南的地盘。冯部调到北京后,吴又在军饷上制冯,使冯感到吴在置他于绝境,使他的部队“即不饿死,亦必瓦解”^①。曹锟上台后,冯原以为自己的地盘问题可以解决,而结果是一无所获。冯想以绥察“两处安插其部下两旅长”,也不可得。不但地盘问题仍不得解决,而且“所部欠饷甚钜,既不稍有贍补,以后月饷曹又不肯发足”。冯因而对吴更为不满,对曹也大失所望,“其愤激之情,殆不可遏”^②。冯与曹吴矛盾的尖锐化,是冯发动这次政变的一个内在因素。

由于冯与吴佩孚的矛盾最为突出,冯就成为反直三角联盟联络的对象。而孙中山之争取冯,是因为冯曾有一些爱国的进步的行动表现。辛亥革命以来,冯在滦州起义、反对帝制、反对“二十一条”,讨伐张勋、反对对南方护法政府的战争等重大政治行动中,都表现他具有一些朴素的爱国的民主的思想因素。因此,冯玉祥有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这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另一个内在因素。

早在1920年秋,冯玉祥由常德调驻武汉时,就曾致书孙中山,表示仰慕之情^③。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会见冯。他们向冯表示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④冯部移驻河南信阳后,冯派其秘书任佑民去广东回访孙中山,并表示只要孙用得着他时,他“当然无不尽力以赴”^⑤。冯驻军南苑期间,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并嘱马代为引荐。马介绍了一些国民党人与冯谈话^⑥。同年夏秋间,孔祥熙给冯带去孙中山赠送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冯读了之后,“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⑦。1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再访冯,告以广东方面情形及孙中山对冯的殷切期望。冯当即对马表示:“政府兵力,数倍于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⑧在此期间,徐谦等还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使节加拉罕相识,他们常有往来,谈论苏联革命后各方面情形,使冯得到许多新的知识。^⑨

由此可见,1920年以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渐加强,使冯逐渐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外在因素。有人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冯发动这次政变没有什么影响^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政变之后,孙中山说过:“在两三年前,便有几位同志说: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由于这个理由,那几位同志便到北京去进行。”这就是指国民党人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对直系的活动。所以孙中山说:“这回变化(按指北京政变)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⑪

在国民党争取冯玉祥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利用冯玉祥与吴佩孚的矛盾,进行拉拢冯的活动。这也是冯发动政变的一个外因。段祺瑞是北洋军阀前辈,又住在天津,有与冯及各方面联络的便利条件,而张作霖则供应段活动的经费。段利用张供应的经费接济冯一些军饷,^⑫通过贾德耀与冯联系。张作霖也直接派人与冯联络。1923年春,张学良密派傅兴沛带着信去北京会见冯,经过冯的参谋长刘骥的联系,冯接见了傅,并表示了解傅的来意。^⑬此后,奉方又派郭瀛洲、马炳南到北京与冯联络。1924年2月,冯与李德全结婚,马炳南代表张学良前往祝贺,并向冯谈到张氏父子愿与冯合作,冯嘱马“要好好负责”^⑭,以后

双方联系未断。

冯玉祥当时已看到了他与段、张在反直上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冯询问邓哲熙说：“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说：“他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没有张作霖，我们就没有出路。”冯说：“对，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对！”^⑮这段对话表明，冯已看到反直战争不可避免，而他在直系中与吴佩孚的矛盾很深，受到吴的压制，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如奉系战败，吴的势力将更大，气焰将更盛，对他的压迫将更严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也需要与段、张联络以对付吴佩孚。

在上述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到1924年秋，冯玉祥已有了反对曹吴的决心，但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敢贸然行事。9月初，江浙战争爆发，直奉大战迫在眉睫，冯认为时机将至，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其注意同志的结合。9月10日，孙岳来南苑访冯，冯同他进行了密谈，说到“现今曹吴专政，国乱民愁”，他“本早已下决心为国除害，以势孤力单，迄未下手”。孙坚决表示竭尽全力相助，又提出胡景翼“早不满意于吴，可引为臂助”，并愿前去联络胡^⑯。经孙与胡接洽，胡同意合作，于是在直系内部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这个同盟的形成也不是偶然的。孙、胡早年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有历史关系。辛亥革命时，孙曾参与滦州起义，胡也曾随井勿幕起义于耀州。这时他们虽都属直系，但都受到吴佩孚的压抑，对吴不满，而与冯则有较深的交谊，且都有联冯倒吴的意向^⑰。这个同盟的形成加强了冯玉祥反对曹吴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任直军总司令，令冯率部出古北口，趋赤峰一线迎击奉军。这一线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冯深感吴是有意使他的部队消灭在荒凉的塞外，更坚定了倒吴的决心。

吴佩孚对冯的密谋虽无所知，但对冯是不放心的。他派付总司令王承斌指挥第二、三军，监视冯的行动。10月4日，王到古北口后，冯为争取王的合作，将秘密计划告王。王虽不愿公开与冯采取一致行动，但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并声明决不泄密。王的同情和支持，使冯对政变的成功更有信心。

冯到古北口后，段祺瑞于9月29日致函黄郛，要黄促冯倒直^⑱，并派其亲信贾德耀给冯送来亲笔信，表示“不赞成内战，并希望冯对贿选政府有以自处”^⑲。冯与贾数度密谈后，10月12日向贾表示：“大局糜烂，拟请段芝泉、张敬舆诸位重出，维持大局”，并请贾和田雄飞回天津见段^⑳。17日田由京回报告此行结果。18日，宋子扬奉段命来滦平见冯。宋说：“检阅使同段督办三造共和，现在乃最终一次之改造，若能真正办到，即当一共和国民于愿足矣。”冯答以“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㉑。于是冯段在推倒曹吴问题上取得了协议。在此同时，张作霖也派马炳南到古北口见冯，双方也达成了推倒曹吴的协议。奉方同意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奉军不入关两个条件。冯也同意热河方面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军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㉒。这一方面解除了冯回师北京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增加了奉军对山海关战线直军的压力，都是有利于冯发动政变的。至此，冯玉祥就只待最有利的时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了。

综上所述，可见北京政变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斗争、直系与奉皖军阀的矛盾斗争，以及直系内部矛盾斗争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爱国的民主的思想又与吴佩孚有着深刻矛盾的冯玉祥，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反直三角联盟的促进下发动起来的。

二

冯玉祥回师北京，在一夜之间，顺利地控制了北京全城，监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使直系中央政权终于倒台，就此而言，北京政变是成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势很有利：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正在高涨；直奉大战方酣；直系内部矛盾重重，曹吴处境孤立。另一方面是由于冯玉祥等运用主观方面的条件，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布署：事前在北京城内外安置了接应部队；行军途中预为回师作了准备；把握住了直军在前线面临危局、吴佩孚正倾全力以挽颓势、北京城防空虚这个最有利的时机；发动政变时军事布署周到，行动迅速机密。

但是，政变后中央政权终于落到了段祺瑞手里，政权的组织形式改变了，政权的反动性质没有改变，政变终归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失败的结局呢？这首先是因为政变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和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急剧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时局的变化是冯玉祥等控制不住的。

政变后，冯玉祥控制了北京，但前线战事尚在进行，直系在南方还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在此形势下，冯、胡、孙将所部组成国民军，准备继续作战。同时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②，要求曹锟下达停战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等命令，企图用曹锟来压制吴佩孚和直系各督，并由现政府促成解决国事会议的召开。但是吴佩孚于10月25日通电声明曹锟所下停战等命令为冯所“捏造”，并宣称奉曹锟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号召各方响应^③。同时率部队万余人回师天津，准备向北京进攻。直系肖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纷纷通电讨冯，并派兵北上援吴。面对直系的挑战，冯玉祥等决定请段祺瑞出山，借段之影响促成山东郑士琦、山西阎锡山出兵阻截直系援军北上。10月26日，冯、胡、孙联名通电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张作霖接到此通电后，因与段原有联盟关系，为了借段以控制冯，也于30日与卢永祥及奉军各军将领联名通电拥段担任反直联军统帅。

冯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使吴佩孚得以拥曹以号召各省，使冯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30日冯离京到丰台，随即接到关于薛之珩（京师警察总督）、聂宪藩（前步兵统领）“图谋不轨，将有反对国民军之动作”的报告^④，使冯不得不立即回京镇慑之。同日夜驻丰台英军闯入冯军步哨线内，不服阻拦，反殴打士兵，并拘留团长冯治安。在内外的压力下，加以财政上的困难，冯不得不改变“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决定请曹锟退职并改组内阁。11月1日，黄郛内阁成立。次日，曹锟被迫辞职，由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务。

为了避免揽政的嫌疑，国民军没有派人参加内阁，却安排了奉系王永江、王迺斌分任内务总长和农商总长。但张作霖仍认为内阁为冯所把持，对它很不满意，奉系阁员拒不来京就职。奉系与国民军的矛盾开始表面化了。

11月1日，鲁督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并将津浦路韩庄站轨道炸毁一段，以阻直系援军北上。同时，晋督阎锡山也派兵进驻石家庄，截断京汉路，以阻援吴军北上。这时吴佩孚的部队在奉军和国民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援军又不能来，吴被迫于11月3日由海上南逃。行前令其残部听候段祺瑞收编，摆出尊段的姿态，以孤立冯玉祥。

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复没，北方只剩下奉系和国民军两大势力，而奉军的兵力大大超过国民军。奉军趁吴军溃败之势，大批开入关内，占领天津后，沿津浦线继续向南推进，同时乘机大肆收编吴佩孚的部队。冯原来要求奉军不入关，其目的在政变后取得北方为他的势力范

围。奉军大举入关，抢占地盘，使冯的打算落空，冯、张矛盾尖锐起来。张采取联段以制冯的策略，冯为加强自己的地位，敦促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在收到10月23日冯等主和通电后，曾于27日致电冯等祝贺政变成功，并表示“拟即日北上”^{②6}。冯等于11月1日复电孙中山，“盼早日莅都，指示一切，共策进行”。^{②7}随后又于11月4日、6日两电孙中山，敦促早日北上，并于7日派马伯援南下迎孙。孙在4日、7日复电冯之后，于8日正式电告冯：“准于元日由粤起行，经沪北上，共图良举”^{②8}。

段祺瑞早有东山再起，重掌政权的野心。冯张拥他为军事统帅，尚不能如其所愿，特别是南方直系各督的态度如何尚不可知，因而迟迟可出。11月上旬，直系南方各督齐燮元、孙传芳、肖耀南等纷纷通电拥段出山。因为他们与冯、张敌对，当然不愿意让中央政权落在冯或张手里，而宁愿让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上台，借段以保存自己的势力。而段得到南方直系势力的支持，可以借它以牵制张、冯。至此段感到自己上台的时机成熟了。当他得悉孙中山决定北上后，电促冯、张到天津开会共商收拾时局的办法，企图在孙到京前把政权拿到手。冯原拟待孙到津后再前往，但11月9日段派罗开榜等到京催促，冯遂不得不于当日起程赴津。

10日，冯、段、张在天津开始举行会议。会议期间，段一方面利用冯主和的主张，拒绝张对南方用兵的主张，以笼络南方直系势力。另一方面与张联合共同对付冯。12日，奉军李景林将王承斌收编吴佩孚残部成立的第二十三师包围缴械。冯玉祥收容的吴佩孚的部分部队，也被奉军吴光新改编。冯受到很大的压力，冯、张矛盾更尖锐了。但是他们在反直方面还有共同的利害。12日，苏、浙、鄂、陕、闽、赣、皖、豫八省联盟会议在南京召开，议决在未有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对于摄阁所发之命令，置之不顾^{②9}。这就促使冯张不得不共同解决政权问题，冯受国民党人的影响主张新政府采取委员制，但在段、张的反对下放弃了这个主张。张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执政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临时执政政府不设国务总理，而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样，实际上就是要取消黄郛内阁，而将权力集中于段祺瑞手里。冯处境孤立，采取妥协的态度，同意了张的建议，并于15日与张作霖、卢永祥等联名通电，公推段为临时执政。

在段尚未公开表示接受推戴时，17日吴佩孚行抵汉口，随即发出组织护宪军政府的通电。除吴自己外，并将齐燮元、孙传芳、肖耀南等二十人列名于通电。这个通电造成了直系各督拥吴的印象，不能不使段犹豫起来。其实齐燮元、孙传芳等并不赞成组织护宪军政府。19日，齐授意江苏省长韩国钧发出通电，表示不赞成吴等17日通电，仍主张由段祺瑞收拾时局。齐孙、肖随即复电表示赞同。同日，直系各督再次联名电请段即日出山。至此，段对直系各督的态度放心了，遂于22日入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

综上所述，可见政变后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直系在北方的势力复灭，但在南方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与奉系和国民军对立。奉系势力伸入关内，与国民军成为北方两大势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皖系段祺瑞为北洋军阀前辈，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虽已无军事实力，但在山东、山西等地军阀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在政变后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段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也利用这些矛盾加强自己的地位。由于国民军与直系的矛盾，段得到国民军的推戴；由于奉系与国民军的矛盾，段也得到奉系的拥戴；由于国民军和奉系与直系的矛盾，段又得到直系南方各督的拥护。于是段一时成为各实力派一致拥护的人物，而得以因利乘便，重掌政权。这是政变后形势变化和各派势力之间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这也就是政变后出现失败的结局的客观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

此外，也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这主要是：一、冯玉祥虽然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并请孙中山北上，但他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它从事的革命事业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把国民党看作是“结党成派，私而不公”的政治集团^②。对于革命，他也“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③。因此，他对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的主张，不能坚持，一遇阻力或与自己的利害冲突时，就动摇了。二、冯对段祺瑞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他还抱有幻想。冯认为段是有众望的人物，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段莫属。冯到天津与段见面时，认为段“表示得非常诚恳”。^④段“以革命政府相标榜”，冯认为，“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可以请他出来”。^⑤三、冯自己的军阀本质还没有改变，还有自己的权力地位打算，还想扩充自己的势力，解决长期以来未得解决的地盘问题，因而在与奉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对段采取妥协的态度。

由于上述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北京政变出现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三

北京政变后，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冯玉祥自己说，这次政变是“革命之行动”^⑥。以后他在五原誓师时发表的宣言中称这次政变为“首都革命”。后来不少人沿用此说法，称这次政变为“首都革命”或“甲子革命”（1924年为农历甲子年故有此称）。段祺瑞当时也说，这次政变“为民国元年第一次革命之延长”^⑦。与他们的说法相反，陈独秀、彭述之当时认为，这次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⑧；“是英美帝国主义更换宰割中国、统治北京的‘代办’”^⑨。还有人认为，“此次名为政变，实则为吴佩孚，冯玉祥二氏之争雄。”^⑩这也就是说这次政变是直系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除了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外，当时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认为，这次政变“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不能算是革命”。^⑪孙中山也认为，这次政变起初“好象真有革命的色彩，随后就‘不象革命运动’了”^⑫。众说纷纭，究竟这次政变是什么性质的呢？

从这次政变中冯玉祥等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政治行动来考察，我们认为，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也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

首先，从政权问题上看，在政变中，冯等虽然监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弃他，也没有立即解散颜惠庆内阁，而是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冯等提出的停战和免去吴佩孚本兼名职等项要求，仍按现政府的法定程序行事，由颜内阁通过决议，再由曹锟发布命令。冯等要求召开的解决时局的会议也拟由现政府促成它的召开。这实际上是承认现政权的合法地位，企图通过它实现自己的某些改革的要求。即使随着局势的发展，冯不得不改变“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决定让曹辞职和改组内阁，他仍以请曹自己辞职的方式使他下台，并由曹下令由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这些政治行动既然实际上承认了现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且按其法定程序行事，就不能说是革命行动。不过由于他们的行动，终于迫使曹锟下台了。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因而在政治上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其次，从政治纲领上看。冯玉祥等在政变后发出的一些通电中，对军阀割据、兵戎迭兴、民不聊生的局面，表示不满，主张和平统一和改革，以“确立建全民治之基础”^⑬。他们看到“内治不修，外患遽至”^⑭的危险，希望“军不成阀，阀不代阀”，以“去民治推行之障”^⑮。他们还提出了“建国大纲”五条，作为“除旧更新”实行改革的纲领。这五条是：“（一）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一）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一）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扰害欺诈行为。（一）信赏必罚，财政公开。”^⑯

这些政治主张，虽然有些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作为改革纲领的“建国大纲”，对外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甚至没有响应正在开展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对内没有触及封建军阀势力，而只是要求改革任用官吏的制度和整饬吏治，显然只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没有任何革命意义。

再次，从实现和平统一和改革的途径看。冯玉祥等在政变当天发出的主和通电中提出，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⑤。随后在10月28日又发出通电，主张“一国贤豪同集京师，速开和平统一会议，将一切未决之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期得最良结果，实力奉行，以绝内争，而安邦本”^⑥。这也就是要求召开主要是各实力派军阀首领和著名官僚政客参加的和平会议。这种和平会议，正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早已指出的，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的，因为“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这只是“军阀之联合”，不是“国家的统一”，民众是不需要这样的和平会议的。冯等没有响应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孙中山所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会议本身是一种革命口号”^⑦，可以“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⑧。而所谓和平会议是没有什么革命意义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见北京政变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政变。冯玉祥说它是“革命之行动”，而实际上他当时对革命的认识还是很模糊的。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⑨。他所谓“改革式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改良性质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动。至于段祺瑞把这次政变说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则是别有用心。他企图借此标榜他将组织的政府是革命政府，以迷惑群众，抵制革命运动。

北京政变虽然不是一次革命，它在历史上仍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这次政变的政治军事行动及其影响看来，其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曹吴政权的倒台，直系北方势力的崩溃，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

直系军阀原来把持中央政权，控制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与陈炯明、沈鸿英等勾结，严重地威胁着广东革命根据地，是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北京政变使直系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而减少了革命的阻力。同时，新成立的段祺瑞政府虽然是反动的，但它处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难以巩固起来。开始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京及其外围驻有重兵，也使段政府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形势是有利于革命的。既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巩固。北京政变后，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蓬勃开展，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始高涨，南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除了其他因素外，这个形势是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

第二，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对以后的北伐战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军的成立表明它开始从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倾向革命。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分析了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冯玉祥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我党在国民军中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国民军在其驻防的地区内，对我党的工作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在北京，有时还争取国民军以“维持秩序”为名，实际上保护群众的集会和游行。这就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五卅运动后，北方

革命运动的高涨,除了其他因素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以后,国民军在反奉战争中,削弱了奉军的势力。在南口战役和西安守城战中,牵制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军。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平定陕西,出潼关,直趋洛阳、郑州,配合北伐军取得了第二期北伐的胜利。

第二,孙中山被邀请北上,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为了宣传革命主义,谋求实现和平统一,应冯等邀请北上。行前发表《北上宣言》,途中又多次发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谋求全国统一的言论,得到全国人民广泛的支持。他到达北京时,受到人民空前盛大热烈的欢迎。他的北上,扩大了革命的影响,特别是把革命思想传播到比较落后的北方,对于唤起北方人民的革命觉悟,促进北方的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清室优待条件的修改,溥仪被逐出宫,铲除了复辟的祸根。

民国成立时订有《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清朝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付;“暂居宫禁”;“宫内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等项^⑤。据此,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仍住在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拥有一大批大臣、太监,颁爵赐谥,发布谕旨,依然是一个小朝廷。虽有1915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加以限制,仍不能稍为抑制。这个小朝廷就成为复辟的祸根。这次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清室“即日移出宫禁”;等项^⑥。11月5日,溥仪被迫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日迁出故宫,清室小朝廷从此消灭。随后摄政内阁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了清点、整顿和保管。这一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北京市民悬旗致庆。只有段祺瑞等人表示不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有进步意义的大事,不仅铲除了复辟祸根,对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历史珍贵文物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北京政变不仅使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的。

注释:

①①③③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7、26页。

② 《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1024)87》,《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2册108—109页。

③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99页。

④⑤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323页。

⑥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19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我的生活》下册381、378、492、412、492、492页。

⑧ 《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19页。

⑩ J. E. Sheride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1966, Stanford Univ. Press.

⑪⑫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900页。

⑬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50页。

⑭ 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30页。

⑮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55页。

⑯⑰⑱⑲ 《冯玉祥日记》卷五,103、115、118、125—126页。

⑲ 《国民军甲子革命纪实》14页。

(下转第126页)

的先河。尤其是,对于辩证唯物论来说,康德的这些思想还是在试图保持(当然没有保持住)唯物论前提下提出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可视为在唯物论、主体能动性和辩证法的基础上解决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以改造全部哲学的先声,它们为这种探索留下了发人深思的启示、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批判地研究、再研究的。

在分别考察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之后,就可以来总结一下本文对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的探索了。先验演绎是由前后相衔的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这样两个任务、方法和进程都不同、甚至相反的阶段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整体。主观演绎是第一阶段,它的出发点——时间中杂多表象的经验意识,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先验演绎的出发点。主观演绎经过任何知识中都必然有的三重综合的条件的追溯,达到了先验自我意识的终点。这个终点同时就是作为第二阶段的客观演绎的出发点。客观演绎通过逻辑的分析径直论证了范畴对一般认识对象的客观效力,由此前进到范畴对时、空中的感官对象和作为一切经验对象的总和的自然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终点。这个终点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先验演绎的终点。而整体的这个终点实质上也就是整体的出发点,不过是“时间中杂多表象的经验意识”同它的先天条件相结合的新概念罢了。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构成这样一个首尾相贯的先验演绎的圆圈,这也许是康德自己提出的“(1)条件,(2)被制约的,(3)从被制约的和它的条件的结合里产生的概念”的“三分法”^{②1}的一种本能的应用和表现吧。

注释:

①②⑦⑧⑨⑫⑬⑭⑰⑱⑳ 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122、120—130、122及130、131、126、102、103、107页。

③⑩⑪⑮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68、33、30—31、30页。

④ 《康德全集》,科学院版,柏林,1968年,第4卷,第475—6页。

⑤⑬⑲ 诺·康·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8—9、275及293以下各页。

⑥ 埃·阿狄凯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柏林1889年,第166页。

⑫ “哲学丛书”第42卷:《康德的逻辑学》,莱比锡,1920年,第161—162页。

⑳ 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上接第109页)

⑲ 简又文:《冯玉祥传》,《传记文学》第37卷第4期139页。

⑳ 《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㉑ 《冯玉祥北京政变》、《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㉒③④⑫⑭⑯ 《北京日报》1924年10月29日、10月30日、11月29日、10月26日、10月29日。

㉓⑲ 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0月28日、11月13日。

㉔⑲⑳㉑㉒ 《晨报》1924年10月30日、11月11日、11月21日、11月26日、10月25日。

㉕㉖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1924年10月上海共和书局出版。

㉗ 陈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向导》第89期。

㉘ 彭述之:《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向导》第89期。

㉙ 《赵世炎生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

㉚ 《国民会议之理论与实践》,《政治生活》第26期。

㉛ 独秀:《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向导》第92期。

㉜ 《东方杂志》第21卷23号124页。

㉝ 《北洋政府公报1924年11月6日第三〇九六号》,《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2册2页。